



引用格式:马拥军,田甜.后启蒙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启蒙:基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视角[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6):1-11.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6.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6-0001-11

后启蒙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启蒙

——基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视角

The new enlightenment of Marxism in the post-enlightenment er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ngels' *Socialism from Utopia to Scientific Development*

马拥军,田甜

MA Yongjun, TIAN Tian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阐述了空想社会主义如何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脱胎而出,科学社会主义又如何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启蒙。这说明社会主义运动并不反对启蒙,而是启蒙的深化、完成与超越。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启蒙运动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对启蒙的初步推进到1980年代的激烈演绎、深刻反思,我国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深化启蒙,并在此基础上改造整个社会。有些人之所以不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深刻意蕴,正是由于缺乏经典著作功底,误从传统教科书角度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意义。这说明,虽然世界看起来已经进入后启蒙时代,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一场新启蒙。

关键词:

启蒙;
后启蒙;
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新思想

[收稿日期]2020-08-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VSI008)

[作者简介]马拥军(1967—),男,山东省临朐县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马克思主义。那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只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读。根深才能叶茂,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其实现了对原初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更深刻理解,从根基深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例如,习近平强调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说法就来自恩格斯。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为了正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和伟大理论,有必要在当今这样一个所谓的“后启蒙时代”重新开展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下简称《发展》)一书中对启蒙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论述,则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一、《发展》对启蒙与社会主义之关系的论述

众所周知,从词义上来说,“启蒙”的中文含义为去除遮蔽、开发蒙昧,在西方语言中的本义为“光明”“照亮”等。学者们对康德以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研究较多,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启蒙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完成是与宗教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1]3},同时又是“颠倒的世界意识”^{[1]3};“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

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1]4}。只有当自身还处于黑暗中时,人们才需要一个虚幻的外部太阳来照亮自己。一旦揭去笼罩着自身的黑幕,你就会认识到原来你就是自己的太阳,完全可以凭自身来照亮前行的道路。

因此,当康德讲他从客体中心回到了主体中心,在哲学上实现了“哥白尼式革命”的时候,准确地说,他只是这场近代革命的引领者。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就曾要求从自然回到人,苏格拉底则要求认识人自身,直到亚里士多德把人当作理性动物,这都是人类的自我意识的表现。在这一意义上,古希腊哲学已经从宗教中挣脱出来了。只是后来随着希腊城邦的衰落,“人自身”才再度丧失,直到罗马确立基督教的国教地位。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则与宗教改革、宗教批判密切相关。从理论上来说,康德主要是在知识论方面实现了“哥白尼式革命”,情感论、意志论方面的“哥白尼式革命”则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联系在一起的。从实践上来说,启蒙恰恰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才最终趋于完成的。

恩格斯在《发展》的第一章开头就指出,就其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2]253};启蒙思想家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2]523}。“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2]254},只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

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2]524}。问题是,这个“理性王国”,无论是理性的国家还是理性的社会,被法国大革命实现以后,并没有消除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人们反而在其中看到了更多的社会矛盾与现实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由此认定,启蒙学者们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他们必须接过启蒙的大旗继续前进。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无论是圣西门、傅立叶还是欧文,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2]525-526} 他们的办法也和启蒙学者相同,即诉诸理性,想通过理性建立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2]526}。他们都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凭什么前人发现的不是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而他们所发现的就是真正的理性和正义呢?难道真理和正义这些东西都是不依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吗?

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就会发现:空想社会主义者同启蒙学者一样,都是持非历史的观点。他们没有意识到:历史本身就意味着不存在永恒的东西,因为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在恩格斯看来,理性不过是“思维着的知性”^{[2]523},而启蒙学者所谓的“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2]526},因此也是历史地生成着、历史地演变着的。同样,“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

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2]524}。无论是资产阶级启蒙学者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超出自己的历史局限性。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一开始就提到:“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2]523} 既然如此,把理想化的资产者作为人的标准,把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社会和理想化的资产阶级国家当成社会和国家的永恒形象,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讲的就是现实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就消灭了自身。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理想形象,但它并不是理想的人的形象。相反,无产阶级同样打上了自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它“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543}。这就意味着,作为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既不是资产者,也不是无产者,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自我改造而形成的崭新的人类。随着“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终结^{[3]592},共产主义新人将应运而生。

在《发展》中,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不仅与唯物史观的创立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剩余价值的发现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两个伟大的科学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在科学社会主义视野中,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因而是完全一致的。“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2]566-567}可见,如果说启蒙运动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自我期许(如果不说是误认的话),那么,科学社会主义代表的就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

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是否代表启蒙过程的结束?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不是这样看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1]197}。这里讲的“否定”指的是对私有制的否定。马克思在论证了“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就是对私有制的肯定,还具有政治性质的和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制的否定,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之后,才研究了摆脱“经济人”即劳动者身份的真正的人的形象——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形象。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从市民社会中解放出来的人的形象,从此以后才开始真正的人类历史^{[1]182-197}。同样,恩格斯在《发展》的结尾也明确提出,共产主义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565},只有在这之后“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2]564}。

二、中国近现代的启蒙历程

中国近现代的启蒙历程大致上以压缩的形

式复制了西方近现代的启蒙历程。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是天下观。天父、地母、普天之下皆兄弟也。天子居天下之中央,是为“中国”;中国之外则为“四夷”。所谓“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堂堂正正做个人”,表现了往圣先贤的自我意识。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历史,破坏了这种自我意识。魏源试图告诉中国人:我们不是生活在天下,而是生活在地球上。但他的《海国图志》只是启发了日本人,帮助日本摆脱了天下观,建立了世界观;大部分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迷梦中,直到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才有更多的先进分子醒悟过来。

于是,重建中国人自我意识的历程便开始了。这一历程的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启蒙。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人们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涌动,人们主张“科学民主,自由平等”,都是这一启蒙的表现形式;甚至连马克思的学说都被当作现代世界的“‘大同’学”传入了中国。但此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立足于资产阶级立场,并未把握到它的精髓。

第二阶段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巴黎和会打破了中国人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幻想,人们终于认识到,所谓民主自由,只不过是强者之间瓜分权益的权力的理想化表达,与弱者毫无关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欢呼这是“庶民的胜利”,“劳工神圣”“劳农神圣”的理念开始在知识分子中扎下根来。

列宁主义接续了被打断的中国历史。从此以后,中国的启蒙运动一分为二:资产阶级关于民主自由的启蒙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神圣”的启蒙分分合合、相爱相杀,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演出一幕幕悲喜剧。

恩格斯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种

现象的线索。按照《发展》第一章,启蒙即人类的自我认识。资产阶级的启蒙找到的是理想的资产者形象,只不过经济关系被抽象掉了。这表明,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身作为私有者的现实存在,反而误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自身的理想形象即真理正义自由民主当成了永恒的现实。空想社会主义者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关系是无法抽象掉的,因此试图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就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指出私有制的废除需要条件,而所谓的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不过是历史的真理和历史的正义。资产阶级只是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从封建社会中解放了出来,因此,他们的所谓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不可能超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范围,顶多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理想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市民社会及其政治国家虽然相对于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解放,但相对于完整的人即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束缚。只有把政治国家还原为市民社会,把人类社会从市民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人才能诞生。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意识不到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微妙区别。在当时,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如何促进启蒙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横亘在中国先进分子之间的纷争不已的难题。胡适在1920年提出,新文化运动包括普及与提高两个方面的内容,他认为“只有提高才能普及”^[4],实质上是主张启蒙向提高方面发展。但胡适所提倡的“提高”,并非针对广大国民知识水平的提高,而是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研究的深化,即“输入学理”“整理国故”。为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考辨,他主张输送大批青年出国留学深造。而陈独秀认为胡适意义上的“提高”并非当务之急;他更强调教育的

普及,推动大学教育覆盖更多国民,重视对国民政治觉悟层次的提高以及具有政治觉悟的人数的增多^[5]。北京大学先前已经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五四运动之后讲演团宣讲活动更加频繁,平民教育的情绪更加高涨。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涌现了更多以办刊为主的平民教育。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其中明确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任务。

胡适和陈独秀误解了问题的性质。相对于李大钊和鲁迅而言,他们都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胡适和陈独秀所说的并不是同一种启蒙。只有对于同一种启蒙来说,才存在普及与提高孰轻孰重的问题。胡适和陈独秀的分歧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启蒙还是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分歧。资产阶级是把现实的人启蒙成理想的资产者,马克思主义是把现实的人启蒙成理想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启蒙以资产阶级启蒙为前提,是资产阶级启蒙的完成和超越。从资产阶级启蒙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才是启蒙的真正提高。反过来看,无论是资产阶级启蒙还是马克思主义启蒙,都有一个普及的问题,在自己内部也都有一个貌似提高的问题,但那种提高实际上是一种精致化要求,要由有钱、有闲的阶层坐下来慢慢打磨。而当时身处时空压缩背景下的中国,需要的是狂飙突进,而不是轻拢慢捻。李大钊和鲁迅抓住了这一时代特征。以李大钊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开启的“庶民运动”深深地扎根在鲁迅心中。他一方面在《药》中痛砭看客的不觉醒,另一方面在《一件小事》中慨叹人力车夫背影的伟岸。在这一意义上,普及和提高对于当时的启蒙而言同等重要,但是普及是提高的前提,普及后国民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后才称得上进一步提高,否则提高只会脱离启蒙对象而成为知识分子自身学术水平的提升,对于整个民族的自我意识觉醒并无多大作用。

要实现普及和高的结合,就必须对社会现实进行改造,因为彼时的启蒙目标不是全盘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观念或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启蒙理念的影响下制造出理想的资产者,而是基于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完善启蒙理念,启蒙出理想的劳动者,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创造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人的形象。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既包括帮助广大工农大众认识到自己作为世界的创造者这一方面,又包括照亮封建旧思想和资产阶级新思想对无产阶级自我认知的遮蔽这一方面,进而找到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自身、走向新世界的道路。无产阶级中蕴含着现存社会的否定方面,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启蒙,才能为建立新社会奠定基础。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接过启蒙运动的旗帜,一方面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推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先锋队定位,在不断革命中实现对群众的持续教育和对自身的不断改造。

尚处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使命。中共一大确立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中共二大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低纲领。从此以后,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的自我要求。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最高纲领。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到抗日战争时期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变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其最高纲领仍然是实现共产主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但其最高纲领仍然是实现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但其最

高纲领仍然是实现共产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其最高纲领仍然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仍然必须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统一起来。

如果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起的作用是帮助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通过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是探索这条道路的成果。但十月革命后,列宁认识到,在生产水平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俄国只能通过新经济政策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6]。后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新经济政策一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需要通过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因而这条道路仍然是一条迂回过渡的道路。问题在于,在迂回的过程中,有一些人迷失了方向,忘记了初心。有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甚至错误地解读了改革开放政策,认定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管用”。学界的观点略有不同。例如,李泽厚认为,中国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前,走了一条“救亡压倒启蒙”的道路^{[8]28-29},他并不否认救亡的必要性,只是惋惜在这个过程中“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战胜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8]32-33},似乎是五四以后的救亡和革命在启蒙任务尚未完成的时候就导致了一个后启蒙时代的到来。李泽厚指出,

马克思主义本来诞生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吸取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一切优良的传统和思想,但是中国近代却没有这个资本主义历史前提,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紧接着便是社会主义;这就使得旧的习惯势力和观念思想借着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衣装,在反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旗帜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以前,轻车熟路地进行各种复辟了。于是“文革”之后人们便空前地怀念起五四,纪念起五四来^{[8]34-35}。按照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意味着启蒙的重新启动。

李泽厚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人都从中汲取营养。但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很多人并没有对他的论证进行研究。21世纪初,“新启蒙”和“后启蒙”两种观点展开了对话。新启蒙的支持者认为革命没有压倒启蒙,而是推动着启蒙的发展,启蒙则对革命起着思想上的补充作用和检验作用,进而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9],应当挖掘中国启蒙思想资源的传统与五四以来的经验,建构新的启蒙。“后启蒙”的支持者从解构主义和多元主义出发,对启蒙和理性主义关系进行批判与反思,他们聚焦于启蒙的不足与问题,特别是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企图对启蒙进行解构^[9]。但就在后启蒙论者试图通过对话进行妥协,承认解构本身并不排斥建构的时候,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进入到了一个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双向互动的“微时代”,阅读的碎片化带来了思考的碎片化。有学者认为,这开启了后启蒙的微时代^[10]。于是,在一个“后启蒙”的时代如何对待启蒙,就成为一个愈来愈突出的问题。由碎片化导致的“后真相”时代会是启蒙的终结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三、新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

从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来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启蒙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走向终结,它只能是一个不断反复进行的过程。

通常所说的启蒙仅仅是理性的启蒙。当康德讲到摆脱人类不成熟状态的时候,他就是从理性的角度来谈启蒙的。问题在于,康德所谈的成熟指的是运用理性的勇气和决心,因此必然涉及人的意志品质。恩格斯在《发展》中谈到的近代启蒙思想家,正是要求用理性审视一切,建立永恒理性的统治。但这是对人类的启蒙。对个人来说,启蒙还意味着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情感。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谈到了费尔巴哈的情感世界观和意志世界观,也就是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启蒙必然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也就是说,人不仅要意识到自己的理性,而且还要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和意志。人的成熟不仅在于形成足够的智慧,而且在于形成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所以,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后启蒙”的内涵实际上还包括20世纪非理性主义的泛滥。正因如此,有学者提出,启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叙事,只有当个体自由成为整个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升之基点时,启蒙方完成了其使命^[11]。

从个体的角度看,启蒙需要反复进行的原因在于,个人的成长是一个过程,而且其知情意的发育并不同步。在这种情况下,启蒙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完成。福柯已经认识到,在从“未成年”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意义上,启蒙既是人类集体参与的一个过程,也是个人从事的一种勇敢行为,而既在人类的意义上谈论成年又在个人的意义上谈论成年,就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了^[12]。马克思曾经追问道:“一个成人

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13]梁漱溟先生的看法与马克思的看法颇相类似:“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接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渐进,后者便是早熟。”^[14]如果说古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而古代中国人是早熟的儿童,那么,作为两大文明的所谓“轴心时代”,就各有自己的启蒙,只不过希腊文明未能发展为一个类似天下观的治理体系。如果说,古希腊已经通过高度发达的哲学“获得自身”,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表明罗马“已经再度丧失自身”,近代的启蒙之所以从宗教改革开始就是由于人到了再度获得自身的时候,所有这一切表明了西方文明的成长,那么,“天下”意识的形成表明中国人找到了自身,中国从古代的辉煌走向近代的衰落表明中国人“已经再度丧失自身”,资产阶级的启蒙表明中国人试图重新找回自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则使中国从天下史进入世界史,从而完成了重新找回自身的任务。福柯认为,直到20世纪,西方人并没有真正摆脱未成年状态。那么中国人是不是已经摆脱了早熟状态,正在走向真正的成熟?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所谓“成熟与否”的判断是否有客观的标准。

在《发展》中,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547}

他由此在哲学标准之外,给我们指定了经济标准。而这正是判断一种文明发育程度的客观标准。

西方之所以无法走向“成熟”,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逼迫人们幻想经济可以永远增长下去。这就像认为人可以一直长个儿一样荒谬。树不能长到天上去,人的个子也不可能一直长下去。与西方政治家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习近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给省部级领导干部和新进中央委员培训班上的讲话中说:经济增长就像人长个子。10到18岁人的个子长得最快,但以后就越来越慢,直到停止增长。人不可能一直长个子。18岁以后人生进入了成长的新常态。新常态不是人生的终结,而是走向成熟的表现,标志着个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表明,习近平总书记真正继承了马克思《资本论》和恩格斯《发展》的思想。经济不能一直增长,而是在某一段时间增长比较快,以后就越来越慢,直到停止增长。这就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但是,正如人不再长个儿并不意味着人生的终结一样,经济停止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再发展。孔子曾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要满足的需要不再限于物质文化方面,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等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今后还将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意义上,中国在身体上正在走向成熟,相当于个人走向了“而立”之年,今后将向“不惑”之年迈进。比较起来,英国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进入“而立”之年,美国早在1929年就已经进入“而立”之年,其他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进入“而立”之年了。此后的经济停滞是正常状态。身体长足了,需要在心理、思想等方面继续成长

了。在这一意义上,这些国家本应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需要,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

由于缺乏经典著作的功底,很多人无法理解习近平关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更不要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的命题了。有人试图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和“中国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来否认甚至否定新时代。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非主观判断,而是有其经济方面的客观标准的。客观标准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后半段。按照当初的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有三个根据:一是人均 GDP 在 2000 年的基础上,到 2050 年翻两番,达到人均 4000 美元的水平,这个指标已经在 2010 年提前 40 年达到;二是在人均 GDP 4000 美元的基础上努力建设比较富裕的小康社会,中国的人均 GDP 到 2019 年已经超过了 1 万美元,在这样的条件下,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提前 30 年以更高的质量完成任务;三是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将提前 15 年,在 2035 年达到这一目标。这就是说,不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项任务已经完成第一项,第二项马上就要完成,第三项很快就要完成,而且,现在的标准要比原来高得多。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要结束的时代。21 世纪中叶的中国将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果这也算是发展中国家的话,那就只能是作为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就是说,虽然按照生产力水平,中国那时候已经是发达国家,但是同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的共产主义相比还有差距。中国的新文明建设将要迈出新的步伐,即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共产主义第一阶

段或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步伐。

很多人不理解,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本身就意味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体现的正是恩格斯《发展》一书中的“自由王国”的特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划分,人类的需要从低到高,包括了自然需要(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个性需要(自我塑造、自我超越的需要)。满足自然需要会使人感到快乐,得不到满足则会使人感到痛苦,因此在满足自然需要的层面上人们总是趋乐避苦,甚至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但社会需要则不同。为了爱、为了尊严,人们愿意吃苦受累,乃至献出生命。因此,社会需要的满足并不是为了求得快乐,而是为了求得比快乐更高的幸福感。比较起来,个性需要的满足带来的既不是单纯的快乐,也不是单纯的幸福,而是自由的感觉。按照恩格斯《发展》的说法,自然需要的满足、单纯的肉体快乐还仅仅体现为“动物的生存条件”,只有社会需要的满足、个性需要的满足才使人“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2]564}。

那么,为什么早于中国一个世纪甚至两个世纪进入“身体”成熟状态的发达国家未能完成心智启蒙的任务呢?原因恰恰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因此与社会需要、个性需要的满足并不相容。资本是能赚钱的货币,因而与货币价值和资本价值联系在一起。能用金钱衡量的才是有价值的,不能用金钱衡量的被视为没有价值的。自然需要、肉体需要、物质需要或通过经济加以满足的需要都是能用金钱衡量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都可以得到满足。与此相应,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都是为了满足这些能用金钱衡量的需要,因而都是货币价值和资本价值的延伸。至于启蒙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赋予它们以另外的“永

恒”含义,只表明他们把这些派生的价值观与其根基即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的联系加以切断,然后把这些派生的价值观理想化。

社会需要与个性需要不能通过发展经济来满足,而只能通过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精神生产来满足。但是这两种生产都已经超越了经济层面,进入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层面,因此其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爱和尊严一分钱不值,但它们是无价之宝,更不要说个性的自由发展了。反过来,爱、尊严和个性会抑制甚至妨碍金钱的力量,把货币和资本当作对幸福和自由的一种侵蚀。这就使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的片面发展的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存在对货币和资本的肯定向度,缺乏对货币和资本的否定向度。资本必须主宰一切,经济发展必须超越一切,凡与此冲突的需要都必须彻底扼杀。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指出,弗洛伊德把用理性压制本能视为成年人的标志,因为放纵本能会导致文明的解体;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是用物欲压制爱欲,放任货币和资本消灭爱、尊严和个性。这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重视“身体”的成长或肉体需要的满足,忽略情感和意志的成长或社会需要、个性需要的满足。这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启蒙走向夭折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低级需要满足之后,高级需要的产生和成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因此,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和资本看起来似乎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但是追求高级需要的新社会运动还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缝隙中艰难地露出头来。只不过,由于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演化为修正主义,其新社会运动既没有坚实的土壤,又缺乏足够的养料,最终演变为抽象、空洞的“政治正确”。比较起来,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早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

毛泽东就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显然也是启蒙,只不过不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无论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或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凭借的都是联合、团结、凝聚的力量,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头30年,工业的年增长率是7%~9%,农业是5%~7%,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本身凭的就是集体的力量,而且增加的也是社会财富、公共财富。尽管从个人财富(特别是个人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从个人收入水平来说,前30年给人的印象几乎是停滞的,但中国的人均寿命却从1949年的35岁增长到1978年的68岁,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也大幅度好转,成为同等生产力水平国家的翘楚。这靠的都是社会整体的力量。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公共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私人财富和物质财富实现了巨大的增长,而且,正是前30年的公共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后40年私人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有可能实现社会需要和个性需要的满足,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创造条件。这说明,社会财富和非物质财富与个人财富和物质财富相互补充,都是社会主义财富观所强调的内容。以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论医学科技,中国与欧洲甚至与欧洲相比,都落后很多,但中国很快控制了疫情,而美国和欧洲却显得束手无策。中国凭借的就是社会的力量,而不是科技的力量。

无论是从工农民主革命演化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从新经济政策演化来的改革开放,

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时代的工作则是在此基础上向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迈进。这毫无疑问需要新的启蒙。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特别强调要读经典、学历史,原因就在于这有助于我们保持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不读经典、不学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时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说法正来自恩格斯^{[3]600-606},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的观点。按照《发展》中的说法,正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科学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2]545-546};至于后人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只不过是使唯物史观成为可能的唯物辩证法的另一种说法^{[2]543-545}。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初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胡适之先生的演说词[N].北京大学日刊,1920-09-18.
- [5] 洪峻峰.五四后启蒙运动的两种走向[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2):25.
- [6]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3.
-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
- [8]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9] 张光芒,张宝明.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J].河南社会科学,2003(1):38.
- [10] 毛崇杰.微时代与后启蒙[J].探索与争鸣,2014(7):10.
- [11] 毛崇杰.启蒙:一个永无休止的叙事:从古代启蒙到后启蒙[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51.
- [12] 杜小真.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530-532.
-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36.
- [1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27.